

# 论马克思“资本创造文化”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马克思“资本创造文化”的思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但长期以来,由于对抗性思维使然,人们把资本与文化简单地对立起来,把资本排除在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之外。这种观点和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能没有资本手段。资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文化。资本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创造、生产剩余劳动,从而创造、生产社会的自由时间,为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资本本性和文化本性又是相悖的,资本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阻碍文化发展甚至毁灭文化。因此,驾驭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既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有用性,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又要有效地遏制和克服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保持文化初心,用高尚的文化解放人、鼓舞人、激励人、塑造人和发展人。

**关键词:** 资本;文化;价值取向;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7)11-015-022

**DOI:**10.13713/j.cnki.cssci.2017.11.003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年-1863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资本创造文化”。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重要思想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其原因在于,在资本问题上,人们习惯于一种对抗性思维,把资本与文化对立起来,没有把资本纳入到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加以考察。其实,资本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既然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也就意味着资本逻辑与文化发展之间具有极大的耦合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文化发展不能没有资本的助力。因此,深刻认识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中国道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马克思文本之中文化概念的厘定

研究马克思“资本创造文化”的思想,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的?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文化理解的差异性,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文化这一概念是在多种意义上交替使用的,而马克思又没有给文化一个明确的定义,因而有厘清的必要。

其实,马克思不仅没有明确定义过文化,而且很少使用文化一词,更没有对文化进行专门论述。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在西方,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缺少文化理论,是“文化空场”。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际。在马克思思想中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文化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的文化理论。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何文化一直表现得如此低调而隐匿呢?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马

**作者简介:** 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克思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叙述方式——“观念的历史叙述”的否定,从而对“文化史”保持警惕的态度。“观念的历史叙述”是当时德国哲学的主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把人类发展史看成是一部“文化史”,这与马克思“现实的历史叙述”大相径庭,马克思确实有理由保持“警惕”,但这绝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真相。那么,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个重要论述:“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sup>[1]29</sup>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显然,马克思不止是警惕,更重要的是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动机。正是基于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鲜明地凸显出“现实的历史叙述”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2]591</sup>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忽视、漠视甚至取消文化的存在及其在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精神生活”、“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等都体现出文化的力量与地位。概括起来,马克思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的:

其一,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这是从人的本质特征意义上的界定。一般认为,从人的本质特征或存在方式来界定文化,或以文化来指证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是20世纪以舍勒、格伦、蓝德曼等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的贡献,实际上,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并不缺少这一重要内容。人的存在方式即是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条件是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的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因而“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这就把人的生命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的生活以及生活资料的生产时强调,“人还有意识”。显然,“人还有意识”是人的“自主活动”形成的先决条件。“自主活动”既是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更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人本质上是文化存在物。

其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文明是两个意义相同的概念。文明有两层含义: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的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成果,即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现实的人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或开放状态;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而这个统一整体又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都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状态,包括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及其与一定社会制度的一致性。马克思更多地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的。譬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sup>[4]184</sup>。

其三,文化是指包括科学在内的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之所以把科学包括其中,是因为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既是“观念的财富”,也是“实际的财富”<sup>[5]170</sup>,并常常把科学与艺术等文化形式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科学是人的智力和精神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确实很少使用文化一词,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否定精神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曾多次使用过“文化斗争”或“精神斗争”这一概念,其“文化”与“精神”是同义词,指的就是精神文化。譬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观点的同时,认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sup>[4]430</sup>。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更是把“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看成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sup>[6]258</sup>,看成是具体的文化形式。

那么,“资本创造文化”中的“文化”是何种意义上的文化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只有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才能弄懂其真义。

“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sup>[7]220-221</sup>

大多学者认为,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广义的,即与文明的意义等同,笔者却不这么认为。这里所讲的文化,无疑是指包括科学在内的精神文化。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马克思强调,剩余劳动

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文化是与物质相对应的概念,不等于文明(人们创造的物质成果也是文明的重要表现),而是指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二是要把这段话放在马克思当时的语境中进行考察。马克思标明,这段话是“对(e)的补充”,而在《政治经济批判(1861年—1863年手稿)》第三章《资本一般》的《绝对剩余价值》中,“(e)剩余劳动的性质”部分着重讨论的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他们“用于闲暇”、“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的时间,因而是“他们发展的空间”或“发展的范围”<sup>[7]214-216</sup>。这与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观点一脉相承。“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sup>[5]86</sup>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看法与马克思高度一致,认为只有“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才能获得“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

## 二、创造文化是资本历史的社会职能

研究马克思“资本创造文化”的思想,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之中。一方面,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规律,为我们理解资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时代直到今天,整个世界总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不管时代特征如何变幻,整个社会生活仍然从属于资本逻辑,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仍然有效。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辩证的,在肯定资本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确认资本是现代灾难的制造者。

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高度赞美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是文明的创造者,当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明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文明的内在精神,文化涵养文明,文明彰显文化,因此,没有文化基础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正如创造文明是资本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一样,创造文化也是资本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当然,创造文化并非资本的故意,而是资本逻辑在运行过程中造成的一种客观的结果。

首先,资本创造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文化观念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

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认为,虽然经济并不是影响历史过程的唯一因素,但“归根到底”,“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性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sup>[3]591-593</sup>。因而,“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sup>[3]657</sup>。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论述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证明。一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私有财产时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而“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因此,“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sup>[4]191-192</sup>;二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sup>[4]527</sup>。

其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创造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出自由时间,从而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指劳动者用于生产维持劳动者自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省。剩余劳动时间与生产力水平成正比,生产力水平越高,剩余劳动时间越多。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总的趋势是必要劳动时间日渐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日渐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sup>[5]83</sup>。这是资本伟大的历史方面。在资本统治中,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从而游离出一部分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产生,不能不说是资本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对于人类发展而言,“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sup>[7]215</sup>;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

自由时间是他们的发展空间或范围;对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而言,自由时间越多,也就意味着人们从事“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sup>[5]67</sup>，“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sup>[5]197</sup>。

再次,资本在创造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出文化生产力。人们往往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从而导致经济决定论。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并不等于物质生产力,而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sup>[8]</sup>的总和。由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个基本领域,与之相适应,人类的生产便有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分。物质生产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产则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马克思非常重视精神生产,经常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提并论。当然,这两种生产并不是并列平行、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的,其中,物质生产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性意义,精神生产则是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以物质生产为主,精神生产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资本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精神生产。一方面,资本必须不间断地从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生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出于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那么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学方面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sup>[9]</sup>。更重要的是,在空间上,资本生产是没有边界的,哪里能赚钱,它就把手伸向哪里。近代以来,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便是有力的证明。尽管文化产业是资本扩张的结果,是资本绝对权力的体现,但它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给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世界性视野。《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一方面,资本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资本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以此为基础,不仅变革社会关系,也改变人们的观念,“一切固

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2]34-35</sup>。另一方面,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尽管资本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它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自己的文明体系中来,客观上为文化的交流、交锋、互鉴、融合创造了条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2]35</sup>。

### 三、阻碍文化发展是资本本性的必然要求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资本也不例外。资本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sup>[4]542</sup>。在文化问题上,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阻碍文化发展甚至毁灭文化。这是资本的文明面和邪恶性在文化问题上的体现。

资本阻碍文化发展根源于资本本性,根源于资本本性与文化的根本冲突。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资本具有反人性的一面。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而绝不是手段。但在资本逻辑中,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人与其他的物一样,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10]</sup>因此,以物为本是资本典型而根本的特征,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成反比,物的价值越高,人的价值就越低。而文化则与之根本相反。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塑造人,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时,把包括科学在内的文化发展看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如果说,在资本统治中,自由时间为文化创造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那么,在未来新社会,所有人都拥有自由时间这种“真正的财富”,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sup>[11]</sup>,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成为现实。不能设想,没有精神文化的发展,没有人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人能够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中超越出来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自由个性。

资本本性与文化本质的根本不同,也就意味着资本与文化又是相互反对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构成了资本发展的限制或障碍,甚至成为瓦解资本逻辑的强大力量,因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sup>[1]120</sup>。当人们逐渐从“物的依赖性”中摆脱出来,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体性的坍塌和人的主体性的复归。这对于资本而言是不可容忍的。另一方面,资本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和绝对权力,就必须把阻碍文化发展甚至毁灭文化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当然,资本不会一味地拒绝文化,而是通过一种物化意识“潜移默化”地改造文化,消解甚至取消文化的力量,以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证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文化是一个意义领域,它使人趋向理想与未来,而资本是一个现实性逻辑,它使人深陷现实的产品与世俗的权力之中而不能自拔。在这个意义上,阻碍文化发展甚至毁灭文化乃是资本的历史性行动。

资本把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从而压缩文化发展的空间或范围。在资本统治中,社会分裂为劳动者和不劳动者,而这种分裂又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裂,因而,剩余劳动时间只是对社会少数不劳动者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这种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他们物质存在的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他们的自由时间,创造他们的发展的范围”<sup>[7]215-216</sup>。而广大的劳动者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这样,一方的能力的发展以另一方的受限制为基础。从形式上看“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

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剩余劳动”<sup>[5]199</sup>。因此,对于广大的劳动者而言,自由时间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这样,一方占有另一方的自由时间而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则因为失去了自由时间而丧失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与范围,这就从整体上压缩了文化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与范围。

资本把所有的精神文化创造者都纳入资本逻辑之中,从而使文化失去了自由创造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化生产分为两个部分,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自由的精神文化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当然是受资本控制的,是为资本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文化的本真性在于自由,而自由创作是文化创造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资本把自由的文化创造者都纳入资本逻辑之中,使之依附于资本,把文化创造变成资本生产的一部分,从而取消了自由的文化创造。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之所在: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律师、诗人、学者、教师、表演艺术家等都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用劳动者。在文学艺术生产中,由于受资本主义方式制约,作家具有了身份的二重性,既是非生产劳动者,又是生产劳动者。譬如,“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sup>[5]219</sup>

资本创造出一个拜物教世界,把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物的关系,导致人的意识物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出一个商品世界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拜物教世界。劳动产品本来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可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变成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在拜物教中,商品结构及其特性渗透到一切领域,劳动力本身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物的关系取代人的关系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根据卢卡奇的理解,这是一种物化关系。更重要的是,当商品结构及其特性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生活方式之中,便形成了物化意识。在拜物教世界中,物化意识支配和主宰着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人的精神领地被金钱或物完全占领,物欲横流,精神被驱逐

了,文化便没有了立足之地。

资本把文化生产变成资本生产的一部分,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文化产业(或译为文化工业)便是资本这种绝对权力的证明。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空间生产的快速推进,这种生产日益成为文化进程中势不可挡的趋势,成为资本生产的一种基本而主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文化产业是资本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按照资本原则构建的一座资本大厦。在资本逻辑中,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都得遵循资本生产的规律,即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的和终极的目标。以这个目标为指引,文化产业生产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或者说,文化产品商品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sup>[12]</sup>,而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因而,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人本特征,从创造以及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退出来,进入到一个世俗的权力体系之中。这样的文化是一种非自然的、虚假的、异化的文化,它取消了人们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使之成为资本所需要的那个样子,尽管文化产业创造出了一个文化“繁荣”的景象。

#### 四、驾驭资本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道路并不是也不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是在经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世界历史进程赋予后发型中国的历史规定性,它不是西方道路的延续或翻版,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探索。这就意味着,尽管中国道路是一条新路,但它是在“世界历史”的芜杂中开辟出来的,是以“世界历史”为前提或背景的。这样,马克思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sup>[6]575</sup>为我所用,便成为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也离不开这个基本视域。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基本的课题是:既要利用资本,又必须摆脱资本的控

制,保证文化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提出的一个现实的历史的任务。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既利用资本,又不被资本所控制呢?要知道,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是不可逾越的绝对的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事实已经证明,中国道路之所以新,就在于它是在资本世界中开辟一条新路,既利用资本,又控制资本。利用资本和控制资本构成了驾驭资本的两个阶段或环节。实际上,驾驭资本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重要而基本的条件。既充分利用资本的有用性,又有效遏制其负面效应,从而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显然,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把资本当成一种手段。正因为资本只是手段,因而才有利用的价值。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的根本分野正在于此。西方道路以资本为原则,以物为本或以资本为本是其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方向,而人则沦为物,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或工具。而中国道路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版本”,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其不可更改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人民幸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资本只是手段,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工具。这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这种一致性“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sup>[13]</sup>这种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我们驾驭资本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底气和力量之源。

利用资本是控制资本的前提。只有利用资本,才谈得上控制资本。利用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力巨大的推动作用。毫无疑问,在中国市场机制中,资本仍然是生产力动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发展不能没有这种动力的驱动。具体来讲,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为文化发展创造基本条件。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基础、自由时间、人的生活领域的扩大和需要的丰富等。一方面,作为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文

化也必须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尽管文化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能建立在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发展生产力正是资本存在的天然的合理性。事实证明,我们借鉴和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的做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由时间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真正属于广大的劳动者,也不再被剩余劳动全部吸收,而是真正成为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意义重大,它既可以是人们文化休闲的时间,享受文化,享受美,也可以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空间,发现美,创造美。同时,随着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空间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需要也越来越丰富,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盈的情况下,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出来。

其次,利用资本的空间生产,大力推进文化生产,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空间生产是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为了促进自身的增殖,资本必然不断地进行经济空间的开拓与生产,把一切要素都纳入到自身生产的体系之中。在当代,资本空间生产的一个典型而重大的事件,就是将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纳入彀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这种生产或扩张仍在进行,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打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超过3万亿,增长率超过13%,文化产业已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一方面,人们需要的精神直接以文化产品的形式生产出来,特别是以“网络+”或“视觉化”或“景观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真正实现了文化共享或文化的大众化,满足了人们巨大的文化需求,这在传统的文化生产视域中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文化共享或文化大众化的基础上,文化“高原”已经凸显,“高峰”正在崛起,精品力作成批涌现。仅从视觉化的文化而言,2016年以来,从电影《湄公河行动》的热映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广受关注,再到《战狼2》空前巨大的票房收入,一批文化精品进入文化市场,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毫无疑问,这里

有文化产业的功劳,也有资本文明作用的彰显。

利用资本又以控制资本为前提。不能有效地控制资本,利用资本便可能是一种纵容。因纵容而任性的资本是魔鬼,它可以搅乱人间的一切秩序,因为“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sup>[14]</sup>。如今面临的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就是证明。对于文化生产而言,更是如此。资本促成了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而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又使资本蜂拥而至。资本是逐利的,一切伦理的甚至是法律上的合理要求,在利益面前都是苍白的。资本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疯狂角逐,无序竞争,从而搞乱文化市场。资本的急功近利,会阉割文化产业的人文精神,而文化产业一旦被资本绑架,就会成为疯狂的赚钱机器,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的想法一样:只要能赚钱,政治上正确与否都无所谓。事实上,因资本逻辑导致的文化乱象已相当严重,一些以赚钱和赚眼球为目的的影视作品,一夜之间,尽毁三观。所以,控制资本是利用资本的当然前提。这也有两个层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生活层面上,克服拜物教和物欲主义、确立正确的生活观是控制资本最有效而又最根本的方式。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生活呢?尽管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真正的幸福生活一定与高尚的精神有关。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黑格尔认为,人是精神的,因此,只有高尚的精神才能与之相配。卡西尔也确认了精神与人的幸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文化所应允的和所能为人类带来的,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幸福,而是一些‘与人类的尊严相匹配的福祉’。文化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间上的福泽,而是要实现自由和实现真正的自律;此一所谓自由和自律,并不是指人类施于自然之上的技术性驾驭,而是指人类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驾驭。”<sup>[15]</sup>幸福生活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或者说,是高尚的精神与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匹配。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只有富足的物质享受而没有高尚的精神与之相匹配,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尚的精神正是

驱逐拜物教迷和消除物欲主义的利器。高尚的精神生活可以使人摆脱物的依赖性而趋向自由个性,这既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文化发展的本质。因此,确立正确的生活观便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当然表征。生活观实际是一种价值观,是价值观在生活中的体现,因此,确立正确生活观实质上是确立正确的价值观。确立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就是要摆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位置。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但精神生活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便充分彰显出来。丰富的精神生活既创造出丰富的文化需要,从而能有效地遏制物质上的欲求,又使人在自由时间里充分享受文化休闲与文化创造的乐趣,从而为自身发展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生产层面上,文化生产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彻底清除资本主体性,坚持人民主体性,就是要“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sup>[13]</sup>。这就要求文化生产要坚持量和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需要日益全面,因此,文化生产必须要有量的要求,生产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没有一定的量,就无法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需要。但这不等于没有质的要求。文化的大众化与霍克海默等人批判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同,是指让人民大众都有机会接受健康文化的滋养。也就是说,思想健康是所有文化产品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当然,量的生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互联网等技术已经普及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网络+等形式,提高文化产品的可视化,从而使文化产品的使用具有可重复性,实现文化共享。另一方面,与量的增长相比,质的提高更重要。这里所讲的质,是比思想健康的基本要求更高的要求,用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讲,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即在“高原”上崛起的“高峰”。这样的文化精品,既受人喜欢,有广阔的市场,又具有强大的涵养化育的功能,与人们对高尚精神的追求相一致。实际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因此,不论是思想的创造者,还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一切文化生产都要牢记文化的初心,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按美的规律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31.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3-104.
- [12] (德)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21.
- [13]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 [14] (美)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M].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45.
- [15] (德)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关之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46.

[责任编辑:黄 昇]